

陈云新时期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吴克明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陈云新时期以来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他对长期领导我国对外开放工作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总结的科学成果,主要体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国策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视调查研究来积极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及注重对外开放的适应性、自主性和系统性等方面,是对毛泽东“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思想、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和以对外开放来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成果等光辉理念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至今仍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吸取其精华,使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我们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彰显出更大的引领效益。

关键词:陈云;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D 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1-0104-07

陈云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云始终坚持并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提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因此,深入学习和探究陈云新时期以来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当代意蕴,坚持并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显

然是很有价值的。

一、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是一代辩证法大师,始终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向外国学习是一对辩证关系。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且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法则。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关键靠自己;外国的东西,有长处也有短处,有好的也有腐朽的,有优点也有缺点。因而,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实行对外开放。这一点,1956年毛泽东在其名著《论十大关系》中,就系统论述过

收稿日期:2016-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评析”(14ADJ710010);2016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毛泽东捍卫国家‘三领’主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A215)

作者简介:吴克明,法学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学习外国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P740)“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1](P742)“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P742)这方面,毛泽东的思想极为丰富,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对外开放思想体系。经济上,提出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人才等思想,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P1435)政治上,提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验和具体制度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等思想,在研究了各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做法之后,认为应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3](P729)等。文化上,提出要认真阅读西方名著,研究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创造出无产阶级新文化,认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3](P751)“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P753)概括地说,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有三点。

(一)“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思想

“一边倒”的概念,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下的现实选择。针对当时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共“一边倒”的指责,毛泽东解释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P1472)当时的美国为了达到战

后独霸世界的目的而挑起“冷战”对抗,形成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别无选择,只能站在与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即“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2](P1475)从政治上看,当时世界已形成两个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如果在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升级后,不进一步密切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就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从经济上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后,中国失去了在资本主义市场购买经济建设所需设备材料的可能性,为了经济上的原因,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倒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一边。

在这一思想主导下,毛泽东把对外开放争取外援的目光重点投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中国经济建设获得了重要的外部援助。其主要措施有:一是争取苏联的贷款。通过利用这些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经济建设中所急需的物资设备,引进大批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改变了新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二是吸引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企业。三是引进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先进技术,包括引进设备、引进人才和开展技术交流等。四是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在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中明确了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出口,凡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五是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学习俄文,广泛宣传介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和实习生,掀起向苏联学习的高潮,从而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后各项事业的胜利发展。

(二)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

葛兰西说过:“政治家往往也从事哲学的著作,但是他的‘真正的’哲学恰好应该在他的政治论文中去找。”^[4]对外开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5]然而,

客观形势和斗争环境并没有给毛泽东提供充分施展这一思想的舞台。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是相当严峻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孤立、封锁、包围我国,形成了对新中国“半月型”的包围圈;20世纪60年代后,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经济上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迫还债,军事上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形成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在如此局势面前,毛泽东的头脑异常冷静,并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情形,先后提出“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中间地带”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美国是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但是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美苏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并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因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1964年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晚年还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实质上,从1946年提出“中间地带”到1964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再到晚年“三个世界”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这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标志着毛泽东在对外开放的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识。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对外开放思想,指明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把开放的重心移向第三世界,使中国在国际上逐渐摆脱孤立的处境。对此,邓小平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处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6]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继续从北、西、南三面包围我国,而美国为了抑制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逐渐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及时捕捉住这一机遇,推动中国在对外开放舞台上好戏连台;1971年

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同年9月,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如果说,新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是1978年后才正式开始的话,那么,对外开放的序幕就是在70年代初由毛泽东亲自拉开的。

(三)以对外开放来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极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注意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说:“不同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也“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7](P160)为此,新中国努力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关系。毛泽东考虑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不完全一致性,在处理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采取明确而坚定的方针,又区别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的具体情况,实行灵活机动的政策和策略,彻底摧毁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毛泽东就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旧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据此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资产;采取适当的方针处理外国在华的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表示,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必须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必须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在此基础上,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注意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来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大业。

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中印、中缅总理分别在联合声明中倡导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毛泽东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7](P165),“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

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7](P210)从1954年开始,基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除了当时反对教条地照搬苏联经验和过分依靠苏联援助,使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摆脱了思想上政策上的束缚外,当时也确实存在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有利条件。如1954年继朝鲜半岛停战后,印度支那战争也将停止,亚洲出现缓和局势;欧洲方面由于1955年苏联与西方国家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也出现了缓和。国际局势缓和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想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1956年4月,英国政府宣布允许一些英国公司出口若干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物资,5月进一步引用“例外程序”对中国取消了橡胶禁运;1956年9月,日本也引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例外程序”向中国扩大输出项目;就连对中国持最强硬态度的美国也在1957年4月被迫放松了对中国的禁运。上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的放松,对于中国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十分有利。正是在这一有利的国家环境下,中国对外开放、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文化关系的思想得到了较大拓宽。这些对外开放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广泛的外交格局,从而使中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毛泽东诸如此类对外开放思想与实践,奠定起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格局,虽然带有明显的探索痕迹,但毛泽东的探索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陈云新时期以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提供了基本思路、主要原则和实践基础。

二、陈云新时期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主要体现

尽管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一贯性,且在实践中成效明显,但每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都不可能超越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都会打上历史时代的烙印,毛泽东同样如此。毛泽东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认识到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摆脱贫穷落后的有效途径。但他并未认识到对外开放是实现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未能把对外开放思想提升到党的基本路线与基本

国策的战略高度,因而,常常因国内外因素的干扰而动摇,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实质上,人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从“地域的”和“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人的交往的扩大与世界市场的开辟,一些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8]列宁也说:“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9]这就要求用世界历史眼光来看待现实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既要把对“国情”的冷静分析与对“世情”的科学看待正确地辩证统一起来,既不脱离“国情”抽象地谈“世情”,也不能离开“世情”孤立地谈“国情”;既要实行对内开放,更要实行对外开放。基于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0]新时期以来,在新的现实环境下,陈云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实行对外开放国策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的东西会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1](P752)“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12](P752)“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13](P753)“学习外国,最终的目的是创新。”所以“吸收外国的东西”是“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14](P753)“应该越搞越中国

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11](P752)对此,新时期以来,陈云在领导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深刻的对外开放思想,其核心是实行对外开放国策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发展的重要体现。

这方面,陈云指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讲了要充分注意对外开放中带来的消极东西。”^[11](P332)“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就引进工作来讲,我认为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11](P262)“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11](P276)还说:“利用世界钢铁不景气的机会,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搞合营,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我赞成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好。对外开放不一定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向国外钢铁企业投资,订购钢材,用一个亿美元可以,用二亿、三亿也赞成。这不是卖国,是爱国。”^[12](P537)“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仍然是在搞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13](P358)“沟通海内外信息,增进相互间了解。”^[13](P379)因此,“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11](P355)不仅如此,陈云还对形成包括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区和开放地带在内的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对外开放格局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大深化了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视域和层次。一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新时期以来,陈云始终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大局,来推动对外经贸的交流和对外开放。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1](P365)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已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加强实体经济,要搞“再工业化”;我们与他们相比仍然落后,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好国外的资源、市场,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一步增强自力更生能力,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二是要抓住用好经济全球化机遇,同时注意防范风险。新时期以来,

陈云在对外经济工作中特别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11](P277)“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11](P380)认为应抓住机遇全面、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开放型经济发展已实现历史性跨越,外需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世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我们产生不小的冲击,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 and 解决新问题,更加稳健地推进对外开放。

(二)重视调查研究来积极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毛泽东一贯要求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认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14](P798)“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11](P746)这些思想理念也为新时期陈云对外开放观所继承和发展。新时期以来,陈云有一句名言:要用90%以上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认为对外开放所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对手涵盖了全球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著名企业,他们都是上百年的跨国公司,人才济济,研发能力强,熟悉国际市场行情,经验丰富,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们要在合作中做到互惠共赢,就必须调查研究、了解对手,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陈云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思想和实践特色,就是重视调查研究来积极谨慎地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体现了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由此出发,他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勇于突破条条框框,开创和发展了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开放事业;他坚持人民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强调运用对外交流手段,在保障人民吃饭穿衣等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搞好经济建设,彰显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他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注重综合平衡,灵活调整对外经贸策略和方针,调动各方积极性,确保我们对外开放事业稳步推进;他坚持大局着眼、小处着手,体现了既高瞻远瞩,又系统缜密、精打细算的“红色掌柜”风采。

例如,1979年5月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宝钢建

设规划和工作进度,他一再对中国与外国、历史与现实进行比较,陈云说这些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感而发,完全是一种平等交换意见的态度,坦率、真诚、实事求是,没有压服,让人听了心悦诚服。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他的看法完全正确。

陈云指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11](P367)“借外债来搞建设,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没有经验,应该逐项研究,积累经验。”^[12](P463)“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13](P379)新时期以来,陈云协助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得以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革开放大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具体来说,一是统筹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更高平台上推动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向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转变;二是积极稳妥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成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优化对外经贸结构,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推动对外经贸平衡发展;三是加强协调,管理和运用好外汇储备,努力推动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探索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运用渠道,形成统一对外合力,最大限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利益又好又快健康发展。

(三)注重对外开放的适应性自主性和系统性

毛泽东指出:“中国和外国要有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14](P751),“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5](P752)“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人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16](P752)诸如此类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也为陈云新时期对外开放观所继承和发展。新时期以来,陈云紧密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求实精神和远见卓识,立足国情、维护民族利益、坚持自力更生、防止和平演变,提出了注重对外开放的适应性、自主性和系统性理念,形成了他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外开放观,是对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创新。

对外开放的适应性理念,就是引进先进的资金、

项目、技术设备要与国内的财力物力人力相适应的思想,这是对外开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要求。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一再表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当我们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受“左”或右的思想支配,就会使我们的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因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陈云对外开放适应性观念的内在要求,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17](P52)认为对外开放、举借外资的目的在于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提高我国技术的总体水平,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一再强调:我国是在人口多、农民比重大、生产力水平低的国情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针对不顾国情、盲目引进的倾向,陈云严厉批评道:“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与日、德、英、法不同,“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18]新时期以来,陈云不仅强调借外债要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要慎之又慎,而且强调借到外债同样要谨慎使用。这样,有利于降低债务负担,尽快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能力,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建设起“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19](P12)。这一道理,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对外开放的自主性观念,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对外开放进程中,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独立国民经济体系的思想。陈云指出:“外国专家是要走的,长期聘请的只是极少数。请外国专家来考察,提意见,这一点要做。但是,究竟如何建设,建成后怎样管理,还得靠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20](P262)“生产、科技、教育、管理部门的知识分子,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最宝贵的财富。”^[21](P312)据此,他明确提出利用外资只是对外开放的手段,目的是要通过引进来增强本国的自力更生能力,加速民族工业发展的速度。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并不是矛盾的,历史已经证明,自力更生为主、对外开放为辅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长期坚持的正确方针。

对外开放的系统性观念,就是在对外开放中要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整体性发展。新时期以来,陈云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怀疑社会主义前景的消极后果,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号召全党要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文明建设失调现象,坚持社会主义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系统开放观。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11](P338-339)“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12](P347)“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13](P354)质言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无论是自力更生还是对外开放,两个文明都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双文明的协调、科学和系统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4] 葛兰西. 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86.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71.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60.
- [7] 毛泽东. 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34.
- [9] 列宁. 列宁文稿(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94.
- [1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64-65.
- [11] 陈云. 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陈云. 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陈云. 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 [14] 金邦秋. 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200-201

【责任编辑:张西山】

CHEN Yun'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New China

WU Ke-ming

(Marxism college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CHEN Yun'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re the results of hi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s as a long-time leader in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They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accelera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an open-door policy, emphasis on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to actively and carefully use th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and stress adaptability, autonomy and systematic aspect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He obvious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O Zedong's glorious idea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such as "leaning to one sid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middle ground"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open-door policy. These precious ideas are still worthy of our study and use for reference. They will definitely play a bigger role in transforming our foreig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mproving our open economy, making us more resilient to global economic risks, and vigorously advanc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 words: CHEN Yun; MAO's thoughts o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